

## 学林

◀ (上接7版)

非好奇也。所遭之境奇，则文亦从而奇焉耳。朱明之季，制义败才。奄竖败政，党祸败人，而流贼胡虏遂败国矣。”（盐谷宕阴《刻二十七松堂集序》卷中，寺仓梅太郎《今古三十六名家文抄》，明治十二年前川善兵卫出版）吉田松阴，这位江户末期心怀忧国情怀的志士，也是阳明学的追随者。本着重时务、重实践的精神，吉田松阴深厌明清之举业文体，他说：“余厌举业文体久矣，而幸此间未有此习也。近世赖山阳作二十三论，尤肖其体，吾不乐焉。然山阳文豪也，犹有生色矣。而学山阳者复出，则陈陈耳。是以每见人策论，必不能终卷也。畅夫见示此稿，谓亦山阳之流也。取束诸几上而不观。次日晨读毕，漫把读之，则别出面目，跃跃欲出，不觉彻尾。呜呼！是吾国之文也，决非彼间举业之流也。如强兵之末论，反覆益喜。”（吉田松阴《评畅夫对策》，吉田松阴《幽室文稿》卷一，明治十四年[1881]序本）只要能激励斗志之文，如韩愈之《谏迎佛骨表》，欧阳修之《唐六臣传后论》，他都推崇备至。

接受中国的儒学乃至子史传统而拒斥八股文，这是日本江户、明治时期汉学的重要特征。

### 伊藤东涯与古义学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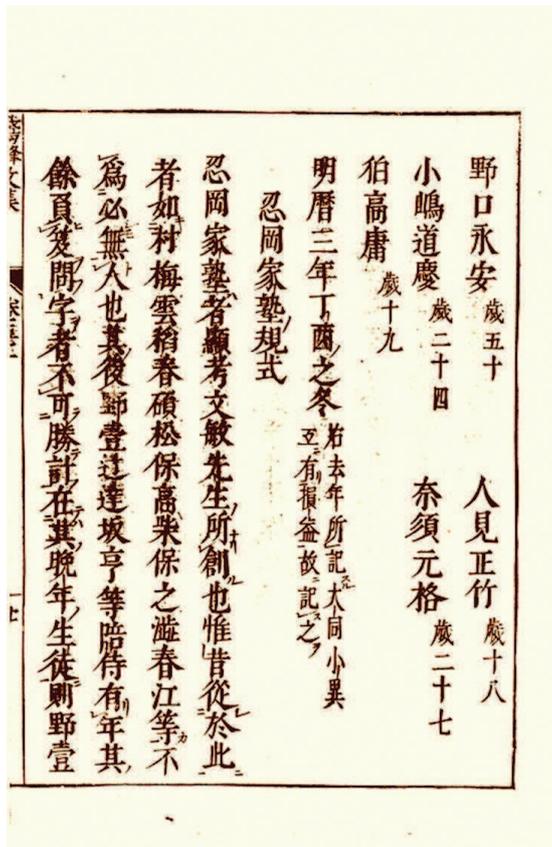
伊藤东涯（1670—1736），名长胤，字原藏，号东涯，谥号绍述先生。他是江户时期京都古学派创始人伊藤仁斋之长子，一生之汉学著述宏富，尤其在经学方面卓有成就。在日本儒学史上，伊藤仁斋、伊藤东涯父子具有重要的意义。在经过了藤原惺窝、林罗山的朱子学派、中江藤树的阳明学派之后，日本儒学史上出现了以伊藤仁斋、伊藤东涯为代表的堀川学派。李庆先生曾对伊藤仁斋、伊藤东涯的学术史位置作出这样的描述：“日本古学派的出现，从思想的逻辑发展角度来看，和中国清代继朱子学、阳明学之后出现考证学相类似。”（李庆《日本汉学史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，第一部第4页）伊藤父子的堀川学派即属于古学派的一大流派。堀川学派也称“古义学”，它以《孟子》为注解《论语》的金钥匙，而对朱子学、阳明学均有批评。

伊藤东涯之写作八股文，与其父亲伊藤仁斋的儒学教育

和儒学思想有直接关系。伊藤仁斋原本崇奉伊洛之学，研习《性理大全》《朱子语类》等书，然也曾涉猎佛老之书。后疑宋儒性理之说有悖孔孟学说。宽文二年（1622）京师地震，于是恍然自得，谓《大学》之书，非孔氏之遗书，及“明镜止水”“冲漠无朕”“体用理气”等说，皆佛老之绪余，而非圣人之旨。于是信者视伊藤为间世伟人，而疑者则以为陆王余说（伊藤长胤《先府君古学先生行状》，伊藤仁斋撰、伊藤长胤编《古学先生文集》卷首，享保二年[1742]京都古义堂刻本）。伊藤仁斋曾说：“自人视之，固有儒有佛；自天地视之，本无儒无佛。吾道师道，岂有二乎哉！”人或疑其混儒佛于一途。于是开始他的讲学。“或私拟策问，以试书生。设经史论题以课文，月率以为常。”“平日劝学者以明道术、达治体为有用之实材，而戒骛于空文，流于记诵。”“其文辞理平穩，务欲易晓而不事繁文绮语。”（均同上）他的学生藤原韶光进一步阐发说：“为文章，道之所贯也。则道岂外乎文哉？故古人力学焉，今人亦学焉。然古人能进道，而今人之所以不能接踵者，何哉？今人之学，佔毕也，词藻也，如行路之徒事行饰焉，未知进路，迷而弗知反者，此所以同学而异效也。”（藤原韶光《古学先生文集序》，《古学先生文集》卷首）伊藤仁斋反对当时“空事华藻，专为雕琢，竞斗是非，漫设城郭”的文风，并由此而创立古义学派。

既然对宋儒性理之说持怀疑态度，因而对于先秦以来的“道统”与“文统”（文章统序）伊藤仁斋有一番新的辨析。他以《论语》《孟子》为本经，《诗》《书》《易》《春秋》为正经，其余三礼、三传等为杂经，总名之曰“群经”。他对于《中庸》《诗》《易》《书》之今古真伪也多有辨析，试图建立真正的文统。“其于古人，最服范文正公、明道先生及许鲁斋三人。尝序《鲁斋心法》而刊布之，以为有实德而后实材从之云。其为文，专宗唐宋八大家。而《文选》浮靡之习，明氏钩棘之辞皆不取焉。在明唯取唐荆川顺之，归震川有光、王遵岩慎中三家而已。其为诗，专祖杜诗，以为诗之圣者。尝爱看《鹤林玉露》《诗人玉屑》等书，又尝称桓宽《盐铁论》，以为其论王道，合于孟子。又谓陆宣公《奏议》、真西山《衍义》皆有益于治道。”（伊藤长胤《先府君古学先生行状》，《古学先生文集》卷首）把范仲淹、程颢、许衡三位视为最具道学风范者。而于明文则以道学之一脉为可取。

作为古义学派的开山祖



忍岡家塾規式

师，伊藤仁斋在京都堀川创办古义学堂，讲学近四十年，号称弟子二千。伊藤仁斋于中国之古今人物最服膺三人：宋代程颢、范仲淹和元代许衡。因为这三个人物不仅博学文章、才节行义著于世，而且有“实德”。有实学方有实德。他所谓的“实学”指的是致用之学。“观春秋战国之际，贤士大夫，诸子百家之流，其为学也，将以致用，非徒为观美。故真纯踳驳、大小浅深，举皆随其学问之所到。”（伊藤仁斋《刻鲁斋心法序》，《古学先生文集》卷一）三公均有济世情怀。他模仿许衡每月课士的教学方法，建立了课士制度，每月朔日为会课日，于《论语》《孟子》及五经中出题考诸生。“或私拟策问以试书生，设经史论题以课文，月率以为常。”（伊藤长胤《先府君古学先生行状》）会课之日，诸生各怀墨卷，置案上，推诸生中通识文法者对墨卷进行点评，评出次第，呈于会长。会长作最后评定，诸生再将墨卷和评语抄录成册，由会长辑为一册。这些经义文究竟是采用八股文的形式还是策论的形式，不得而知。但伊藤东涯说过：“其教导生徒未尝设科条，严督察”（同上），“时命经义，直述主意，不务华藻，或从旧说，或用己见，各任其便云。”则诸生之墨卷在形式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限定。伊藤仁斋文集中有“私拟策问”多篇，基本上都是经义策。他考诸生也多以策问的形式，“自宽文辛丑至元禄丁丑，凡三十余年，设问策诸生。”（伊藤东涯跋语，《古学先生文集》卷五）

古义学堂的月课制度与林

罗山父子的忍冈私塾月课制度的一大不同是，忍冈私塾是以经、史、文、诗、倭五科课士，古义学堂则集中于对儒家经典的讲习与考核。古义学堂的经义文究竟是什么形态？伊藤仁斋曾为其古义学堂制订了《私试制义会式》，称“制义昉于宋，盛于明，乃科场之所重也。国家旧罢贡举，故士子多不修文词，虽知讲道学经者，然不深于斯，则孤陋寡闻，不能直达经指源委。必也不穿凿，则失之肤浅。孔门有言语科，良有以夫！”（伊藤仁斋《私试制义会式》，《古学先生文集》卷六）他仿照宋明科场之制义文形式，每月出题一次，先用《语》《孟》，次及本经。实为开卷考试，在会课之日，诸生将其所作制义带至私塾，互相切磋，然后由会长批改，然后结集成册。所试虽以“制义”为名，事实上可能不是八股文。伊藤东涯解释说：“时命经义，直述主意，不务华藻。或从旧说，或用己见，各任其便云。”（同上）所谓“不务华藻”“各任其便”，不仅是内容上让诸生抒写自己对儒家经典的认知，而且在形式上没有专门的要求。

八股文的根基是儒学，但儒学的发达却不一定催生出八股文体。伊藤仁斋为东涯提供了一个研习儒学之家学，但最终促使伊藤东涯进行八股文写作实践的主要内在动因，则是他对文章的形式美之追求。

事实上，自伊藤仁斋起，即已在强调文以载道的同时注意到了“文”的重要性。在为《文式》一书作序时，伊藤仁斋对“文”作了正面阐述，他说：“作

文有儒者之文，有文人之文。儒者之文者，孟、荀、董、刘、韩、李、欧、曾之类是已。至于文人之文，专事瑰绩，轻剽浮华，不足以登樽俎之间。”（伊藤仁斋《文式序》，《古学先生文集》卷一）与中国那些断言“作文害道”的理学家不同的是，伊藤仁斋同时强调：“言之无文，行之不远。”（同上）

重修辞、重方法的思想到了伊藤东涯那里，得到了进一步的强调。伊藤东涯于元禄元年（1688）刊行《文章政治》，并写了一篇后序，指出：“《文章政治》者，作文之规矩准绳也。凡学为文者不可不本之于六经，而参之于此书。本之于六经者，所以得之于心也；参之于此书者，所以得之于器也。穷经虽精，谭理虽邃，苟不得其法焉，则不足为文。”（伊藤东涯《文章政治后序》，伊藤东涯《绍述先生文集》卷三，宝历[1758—1761]间文泉堂刻本）对“得之于心”与“得之于器”同时重视，这是文章学的自觉。与伊藤仁斋之鄙弃“文人之文”略有不同，他主张“不必斥文辞，故取于文章家；不必崇华缛，故求于经术家。”（伊藤长胤《史论奇钞序》，松崎佑之编《唐宋名家历代史论奇钞》卷首，正德四年[1714]竹苞楼刻本）对于器、技、法的重要性，他作出了充分的强调。他致力于建构文法体系，其标志性的作品就是他的《作文真诀》（该书完成于其八股文写作的同一时期）。尽管在《作文真诀》中多处标明“见《文章政治》”，标明它的文献来源，但伊藤东涯还是对陈绎曾的“古文谱”图系进行改造、重构。在《文章政治》的“古文谱”中，陈绎曾以式、制、体、格、律五大范畴去建构其体系。在这个体系中，叙事、议论、辞令属于“式”，而“体”则有“文体”、“家法”二则。伊藤东涯则以体格（文体）、体段（结构）、句法、字法、章法去建构其文法体系，把叙事、议论、辞令变成文体范畴，再加上辞赋，从而突破宋代文章学的科举文体背景。此书虽不及制义文体，但他对文法的强调与他在这一时期的制义写作实践大有关联。

曾对安东省庵、伊藤仁斋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的朱舜水，在日本长崎时曾痛斥八股文之有害、八股文“非文章”（朱舜水《答安东守约书三十首》，《朱舜水集》，中华书局1981年版，第173页），但这并没有影响伊藤东涯对八股文的兴趣。44篇制义文是伊藤东涯对儒学美文的一次实践，尽管这实践的过程中充满了犹豫。

（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）